

江苏大学党委书记袁寿其:

“双一流”建设不是简单“拔尖”

本报记者 陈彬

今年年初,袁寿其结束了自己在江苏大学校长、书记“一肩挑”的工作状态,正式卸任校长,“专职”担任江苏大学党委书记。而就在卸任校长职位前的一个月,袁寿其刚刚在媒体上公开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,这也是他最后一次以校长身份对公众发声。

这篇文章的主题只有一个——“双一流”建设。这是自2015年国家提出“双一流”建设以来,袁寿其在脑海中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。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记者专访时,袁寿其的话题也没有离开“双一流”建设。

两个逻辑

既然讨论“双一流”建设,首先需要明确一个概念,什么才能算是“一流”?

“所谓‘一流’,必须是在某个领域中大家公认水平最高。”袁寿其表示,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,是“公认”一词,它代表着一流学科与一流大学往往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,反而更像是“圈内人”的一种约定俗成。而这其实是给“双一流”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。

“政府提出‘双一流’的目标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甚至可以说,‘双一流’就是国家‘两个百年梦想’在高校中的具体体现。但其评价体系的建立却是一个难题。”采访中,袁寿其举例说,我们的干部选拔制度经过几十年修订,至今尚有不完善之处;高考制度几经变革,依然受人诟病。因此,指望“双一流”评价体系一开始就被公认是很难的。

然而,这并不妨碍高校向“双一流”的方向努力。

袁寿其在2016年年末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曾提到,学科是构成大学的基本元素,一流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基石,“双一流”建设的核心就是一流学科建设,这就赋予了高校优势特色学科在“双一流”建设中的神圣使命。

他表示,要发挥好优势特色学科在“双一流”建设中的引领作用,必须要突出两个聚焦:首先是要聚焦学科学术逻辑,提升学科实力水平;其次是聚焦学科社会逻辑,服务国家重大需求。换句话说,学科建设要对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,尤其是一流学科更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和科技前沿领域,精准发力。

“一个学科的发展,首先要在学术上有先进的地方,同时对社会要有贡献。这一点,不管对基础学科还是应用学科都是通用的。当然,发展基础学科的眼光要放得长远一点,但如果以世界一流为目标的话,大方向是不能改变的。”袁寿其说。

那么,发展一流学科,进而建设一流大学,我们该从哪里入手呢?

三个原因

作为高校,人才培养自然是最重要的责任,袁寿其便将“双一流”的突破口放在了这里,尤其是人才的国际化上。至于原因,他的解释言简意赅:“如果全世界的优秀年轻人都要在中国上大学,那么中国的大学就是世界一流大学。”

然而遗憾的是,至少在目前,我国高校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还是相对不足,在对外交流中,我们的优秀人才大量外流的大趋势在短时间里似乎也难以改变。对此,袁寿其作出了自己的分析。

“首先,产生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,还是国内高校在科研和教学方面距离国际先进水平尚有一定差距,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现状。”袁寿其说。其次,我们在国际交流中还存在语言沟通不力的问题,毕竟世界上其他国家会讲中文的人并不多。于是,语言就成为了我们沟通的一种障碍。“尤其是一些非英语国家,语言在人才交流方面就更成为一个问题。”此外,袁寿其还强调,在观念上,目前国内部分高校的国际化意识并不强,少部分人甚至还抱有“为什么要拿国内资源培养外国人”的观念。

对此,他表示,我们一定要意识到,目前国内顶尖学者很多都是在国外留学多年的,其创造的价值也是在国外学习后才产生的。当前,我国在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上已经是世界强国了,但我们不能只输出物质产品,同样也要输出智力产品。我们培养留学生,把他们培养成校友和朋友,这对于我国未来的文化软实力以及未来的国际学术交流都大有裨益,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。

在袁寿其看来,在这三个原因中,前两个原因在短时间里是难以改变的。因此,如果说人才的国际化是“双一流”建设的突破口,那么国际化意识的加强就可以看作是人才国际化战略的突破口。

“我们的产品已经遍布全世界,但培养的国际人才还很少,影响力也不够,文化软实力更加不够。目前,随着‘一带一路’战略的实施,国内高校也迎来了国际化新机遇,我们应该有所作为。”袁寿其说。

“我们当然不能按照这样的模式对高校进行

划分。试问,如果培养精英人才只是顶尖高校的事情,那么仅仅毕业于普通院校的马云是否应该算是精英人才?”袁寿其表示,每所学校都会有自己的优势学科,每个学科也都有优秀的青年人才,这些学生的发展一定是以精英为培养目标的。因此,如果非要培养精英人才的培养任务落到少数几个学校,这显然是错误的。

然而,每所学校除了有优势学科之外,也存在大量非优势学科,它们的培养目标也应该是精英人才吗?

对此,袁寿其举了这样一个例子。2016年,江苏大学共有近200名学生出国留学。其中一名毕业于英语系的学生被世界顶尖名校哈佛大学录取,而英语专业在江苏大学是名副其实的“弱势学科”。“这说明,无论学科本身地位如何,都应该朝着精英人才的培养目标努力,努力了不一定做得到,但至少会比现在要好得多。”

一个标准

2015年年底,国家确定了“双一流”建设的总体规划。但时至今日,原本拟于2016年发布的“双一流”建设实施办法却并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。对此,袁寿其表示,对于高校而言,“双一流”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好的顶层设计,同时也需要明确一些细则。“目前‘双一流’的大方向已经明确,但具体政策却并不明晰。”

此外,袁寿其也表示,政府还需要出台一些政策,对高校进行引导和鼓励。“在我国,政策的驱动力是很强劲的,因此我们要打好‘政策牌’。但与此同时,在一些包括人、财、物等方面的政策上,目前高校普遍感觉束缚还比较多。今年由于上海和浙江的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进入完整的一轮,将要迎来最后高考录取的时刻,更成为全国聚焦的话题。

其实,对中国人来说,高考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。

不过,当今对高考制度,总体而言是新闻报道多、理论研究相对较少,一般议论多、深入探讨相对较少。高考是一个谁都可以说上两句的话题,又因为其利弊都十分显著,人们从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角度论说高考,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看法。但是,对高考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国家考试制度,不能只凭一腔热情和激情,还需要冷静和理性,否则所发言论就可能变得情绪化。

由于高考是一个至为复杂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,是一个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制度,站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立场上评说,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观察,可能所见都是事实,所言也都有一定道理,但也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、各说各话的情况。因此,在评价高考时,重要的是全面和客观,而理性、全面地评价高考,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,就应该对高考作深入的研究。

40年来,高考制度已历经许多变化,无论是考试的内容和题型、试卷的难度等,现在的高考与1977年的高考都不可同日而语。但高考也有其不变的方面,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公平性上。社会大众对高考最大的期望是能够发挥公平选才的作用。高考的主要机制是公平竞争、择优录取,与以往的推荐等其他选才方式不同。尽管高考制度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,但是这种公平竞争、择优录取的机制还是基本保留下来了,始终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。自主招生、推荐面试、三位一体综合素质评价等其他招生方式在总的比例中还不是很高,虽然这些方式会逐渐尝试推广,统一考试成绩可能会逐渐减轻其绝对权重,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,应该还是中国高校招生的主要依据。

高考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,它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,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,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。坚持高考制度,有利于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。高考制度有其局限和弊端,但它仍是目前相对最公平的考试。对中国而言,高考制度必不可少。高考不改不行,但急于求成也不行。

欣逢恢复高考40年的盛事,全国媒体又将对1977年高考进行“集体性怀旧”,各地各校将举办一系列的77级同学会、高考恢复40周年座谈会和纪念学术会议。作为中国考试研究的一个重镇,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正在积极筹备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、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在今年适当时间联合举办“恢复高考40周年学术研讨会”。

当年意气风发的77级大学生,毕业后在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舞台上大显身手,时隔40年之后,如今多数已经退休。但由于1977年的高考是13届学生的考场,77级大学生的年龄差异极大,因此,至今还有许多77级大学生仍然是政界、商界、学界的中坚力量。

今年许多人将再度回忆恢复高考那青春燃烧、壮怀激烈的岁月。然而,我们既要涉及个人关于高考的回顾和高考故事的叙述,更应该重视恢复高考的全景扫描和历史复原,尤其要关注对高考改革的学术探讨,思考和展望高考发展与改革的未来,为高考改革提供理论参考。因此,回顾高考40年的发展历程,不但具有历史价值,而且具有现实意义。

2017,必将成为又一个中国的“高考年”。(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、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)

壹月教评

2016年度国家科技奖励 通用项目高校占近八成

今年1月,最受科教界瞩目的无疑是科技奖励大会。

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1月9日在北京召开。据教育部消息,全国共有118所高等学校作为主要完成单位获得了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通用项目172项,占通用项目总数221项的77.8%。其中,有75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奖项目数为130项,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58.8%。

无需多言,高等学校一直都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柱性力量。相对于企业和科研院所,高校的科学探究有着自己的特点,比如科研的自由度更大一些,也更能发挥科研人员的科研主动性。但自由度大也会带来一定的副作用,那就是很容易导致科研项目脱离实际。事实上,这也是很多高校科研项目难以落地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作为高校,如何在科研人员的“自由”和“实际”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,使高校科研既能发挥其主动性,又不至于过分脱离社会生活的实际需求,这是一道很难解的题目,不过一旦通过制度设置将其解决,无疑将更加解放高校的科技创新能力。

2016年全国民办学校 在校生突破4825万人

1月18日,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,介绍了《关于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》以及配套文件有关情况。发布

会上公布的信息显示,2016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民办学校17.1万所,比上一年增加了8253所;在校学生4825.47万人,比上一年增加了253.95万人。

岁末年初,民办教育,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的话题一直很多。先是2016年11月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的决定,颁布了多项有利于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。2016年12月初,由施一公担任院长的西湖高等研究院宣告成立,这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“剑指”世界一流的民办综合性高等研究院。

民办教育近几年在我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,这一方面得益于大量社会资金的涌入,同时,国家相关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但需要注意的是,国内民办教育的环境虽有改善,但与公办教育相比依然有所差距。比如在公众眼中,民办教育依然没有摆脱“低档次”的印象;再比如在国家的资金支持方面,民办教育还属于空白。在这种情况下,比民办教育数量增加更重要的,还应该是质量的提升,这里的质量既包括其本身的办学质量,也包括周边的政策环境质量。

北京高校就业率 达97.39%

本月初,北京市教委发布了《2016年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》。据统计,2016年高校毕业生的总体就业率为97.39%,各学历层次毕业生的就业率均保持较高水平,都在97%以上。

单从数据上看,2016年高校就业率可以用“喜人”来形容,但相信看过数据的大部分人都不会有这样好的心情。原因很简单,近些年来,不时

就会有各种就业率统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,而且几乎每个报告统计的就业率都不会太低。但与此同时,一年又一年重复而来的“史上最难就业季”却提醒着人们,大学生找工作依然是个难题。

如此,我们的就业统计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?作为学生在求学时选择学校和专业的一个重要参考,就业率统计是有着重要价值的。但在另一方面,就业率的高低关系着众多机构的“面子问题”,太低的就业率自然交代不过去。于是,各种就业率造假纷纷沓来,导致的结果就是就业率越来越高失去其原有价值。

在此,笔者并非怀疑此次北京市教委做出的就业率统计有何失当之处,只是提醒相关部门,有时候少顾及一些“面子”、多尊重一些数据,或许更能回归就业率统计的初衷。

逾6成学生 不清楚校园贷风险

2016年,“校园贷”成为了很多大学生都关注的一个话题,这一话题的热度也持续到了2017年。

不久前,某民调中心针对大学生校园借贷现状与认知开展调查。结果显示,对于校园借贷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,65.73%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或是对此“有印象但不清楚”,30.18%的学生表示“知道部分”,仅有4.09%的学生表示“清楚知道”校园借贷的金融风险和法律风险。

校园贷款的盛行是和“90后”群体成为大学生主体的现实相关的。毕竟相对于“80后”群体,“90后”成长的经济环境要更发达,他们对于金钱的使用也更加随意。这也导致了“90后”群体对于借贷并不像“80后”群体那样慎重。然而,我们对于“90后”在金融方面的教育

海峰随笔

恢复高考30周年似乎才过去不久,转眼间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2017又已到来。长期压抑后的解放、久旱逢甘雨的渴望、复习备考时的紧张、高考过程中的神圣、金榜题名时的喜悦……凡是经历过恢复高考洗礼的大学生,回忆起1977年高考的往事,都是记忆犹新,仿佛如昨。

1977年恢复高考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,标志着中国招生考试史的新纪元,也是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,而且是中国社会由乱而治的转折点、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拐点,所以一直以来都是人们谈论和回忆的一个话题,每隔10年就会形成一次讨论的高潮。高考恢复30周年的时候,全国几乎所有媒体都出现了“集体性怀旧”,对恢复高考的历史作了一些回顾、反思,也出版了很多纪念性的文章和著作。今年是高考恢复40周年,又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念年份。

除了高考,很少有哪种教育话题会吸引举国民众的广泛关注,很少有哪个历史事件过了三四十年还会引发无数的回忆和感慨。因为高考与中国每一个地区、每一个读书人密切相关。年年岁岁“考”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每年一次的高考,吸引着社会各方面高度关注的目光,每到考试和录取季节,更是各种媒体争相报道的中心。高考改革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话题,也一直牵动着全社会的神经。每年夏天,高考更会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,今年由于上海和浙江的高考综合改革试点进入完整的一轮,将要迎来最后高考录取的时刻,更成为全国聚焦的话题。

其实,对中国人来说,高考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话题。

不过,当今对高考制度,总体而言是新闻报道多、理论研究相对较少,一般议论多、深入探讨相对较少。高考是一个谁都可以说上两句的话题,又因为其利弊都十分显著,人们从不同的立场、不同的角度论说高考,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看法。但是,对高考这样一个影响重大的国家考试制度,不能只凭一腔热情和激情,还需要冷静和理性,否则所发言论就可能变得情绪化。

由于高考是一个至为复杂的大规模选拔性考试,是一个“横看成岭侧成峰,远近高低各不同”的制度,站在任何一种特定的立场上评说,从某一特定的角度去观察,可能所见都是事实,所言也都有一定道理,但也可能会出现盲人摸象、各说各话的情况。因此,在评价高考时,重要的是全面和客观,而理性、全面地评价高考,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,就应该对高考作深入的研究。

40年来,高考制度已历经许多变化,无论是考试的内容和题型、试卷的难度等,现在的高考与1977年的高考都不可同日而语。但高考也有其不变的方面,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公平性上。社会大众对高考最大的期望是能够发挥公平选才的作用。高考的主要机制是公平竞争、择优录取,与以往的推荐等其他选才方式不同。尽管高考制度经历各种各样的变化,但是这种公平竞争、择优录取的机制还是基本保留下来了,始终以高考成绩作为录取的重要依据。自主招生、推荐面试、三位一体综合素质评价等其他招生方式在总的比例中还不是很高,虽然这些方式会逐渐尝试推广,统一考试成绩可能会逐渐减轻其绝对权重,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,应该还是中国高校招生的主要依据。

高考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,它事关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,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,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。坚持高考制度,有利于维护我国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。高考制度有其局限和弊端,但它仍是目前相对最公平的考试。对中国而言,高考制度必不可少。高考不改不行,但急于求成也不行。

欣逢恢复高考40年的盛事,全国媒体又将对1977年高考进行“集体性怀旧”,各地各校将举办一系列的77级同学会、高考恢复40周年座谈会和纪念学术会议。作为中国考试研究的一个重镇,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正在积极筹备与江苏省教育考试院、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在今年适当时间联合举办“恢复高考40周年学术研讨会”。

当年意气风发的77级大学生,毕业后在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教育舞台上大显身手,时隔40年之后,如今多数已经退休。但由于1977年的高考是13届学生的考场,77级大学生的年龄差异极大,因此,至今还有许多77级大学生仍然是政界、商界、学界的中坚力量。

今年许多人将再度回忆恢复高考那青春燃烧、壮怀激烈的岁月。然而,我们既要涉及个人关于高考的回顾和高考故事的叙述,更应该重视恢复高考的全景扫描和历史复原,尤其要关注对高考改革的学术探讨,思考和展望高考发展与改革的未来,为高考改革提供理论参考。因此,回顾高考40年的发展历程,不但具有历史价值,而且具有现实意义。

2017,必将成为又一个中国的“高考年”。(作者为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、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)

恢复高考40年的历史记忆

刘海峰

(陈彬)